



思人耐物心記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刊

10

编 委：刘元美 冯先云 夏佑新 彭世雄 刘清楚

龙剑宇 沈立冬 张正山 李建国 傅笑然

彭雪梅 黄金兰 李湘蓓

主 编：刘元美

副主编：夏佑新 龙剑宇

编 辑：龙剑宇 刘丽丽 王 健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

潭新出准字(2004)第 53 号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刊

10

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8.7 字数:210,000

版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目 录

毛泽东生平业绩

- 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 --- 陈登贵(1)
试述毛泽东早期统战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陆米强(8)
毛泽东促成中央红军通道转兵的历史贡献 夏远生(13)
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罗存康(24)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及其伟大实践 龙 峰(37)
“和平崛起”的提出和现实意义 王 健(54)

伟人足迹

- 毛泽东与清凉山 王光荣(63)
建国后毛泽东八次到广州 洪 霓(73)

毛泽东书法、诗词学习

- 追寻毛泽东的书艺之路 刘宏章(82)
我读毛泽东诗词的三个切入点 邹燕舞(89)

追溯与思念

- 日出韶山东方红 马玉卿(92)

读毛主席《蝶恋花》有感	王肇君(96)
献诗祭奠毛公	唐少斌(98)
七律 纪念毛主席 110 周年诞辰	杨亚平(101)
毛主席家规	张 翹(101)
嵌名联两副	张 翹(102)
满江红	汪海元(103)
中吕 山坡羊	易中兴(103)
韶山	刘起文(104)
念奴娇 毛泽东纪念馆	刘宏章(104)

无尽缅怀

永远的毛泽东	贺 灿(105)
对月抒怀	朱长先(107)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彭 艳(108)
明月开慧	冉文中(111)
军号的胜利之声(外一章)	毛华松(116)

韶山印象

韶山毛泽东故居速写	文 霞(118)
-----------------	----------

旅行纪游

海南岛上的“毛公山”和毛泽东热	陈 雄(122)
湖南旅行札记	邵亚琳(125)

基地研究

有效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 刘元美 夏佑新 彭世雄(134)

“一号”工程 千年大计 龙剑宇(141)

加强自身建设 发挥基地作用 刘 伟(146)

对充分发挥基地教育职能作用的思考 彭 艳(152)

芷江受降纪念馆创建文明单位纪略 江洪、张智勇(154)

博物馆学探讨

历史知识在革命纪念馆中的运用 刘丽丽(158)

从“美”的视角看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文 霞(166)

陈列主题与观众的认知 陈 意(176)

现代科技与博物馆

毛泽东用过的磁带、唱片的数字化保护 肖 旺(179)

数字化博物馆漫谈 冯 瑛(185)

历史图片的扫描和修补 谭 凯(192)

宣传教育

陈列内容在讲解中的适当表达 彭 芳(196)

谈谈讲解员的素质问题 李 莹(200)

我对讲解词的认识 张轶轶(203)

谈讲解员的语言运用 白晓波(207)

讲解的语言表达艺术 胡 蓉(211)

接待工作

- 曾庆红视察韶山 张素娥(214)
- 尉健行在韶山 张素娥(221)
-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副总书记若泽·多斯·雷斯在韶山
..... 张素娥(223)
- 非洲五国政府文化代表团一行访问韶山 张素娥(226)
- 扎哈维·马立克一行访问韶山 张素娥(228)
- 乌干达总统事务部长访问韶山 胡 珊(231)

文物保护和征集

- 我征集《明耻篇》的经过 汪久成(233)
- 馆藏书画的保护 陈新征(236)
- 毛华松捐献的几件革命文物 研究室(241)
- 湘军提督沈洪斋的坟契 研究室(245)
- 漆线雕《祖国万岁》 李湘蓓 卢爱平(247)
- 苏绣《毛泽东在庐山》 卢爱平(249)

乡土文化

- 历史长河中的韶山 郝天雷(250)
- 我所了解的赵先桂 赵 迎(265)
- 韶山乡土文化的代表人物汤鹿秋 纳于山(270)

大事记

..... (273)

后记 (277)

毛泽东生平业绩

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

陈 登 贵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用军舰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开辟这条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有一个曲折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一、毛泽东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在中国,农民占了总人口的 80%以上,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决定了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革命作用,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

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中,认识到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便下决心研究它。他在 1925 年曾写道:“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是年他到彭湃主持的第五届广州农讲所担任教

员。1926年他在第六届农讲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第一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地分析。他指出:“无论那一个国家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种种不同的态度”。[2]

毛泽东还根据历史与现实的国情,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和革命目标等5个方面论述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无由解决,故国民革命大部是解决农民问题,其余问题皆不如农民问题的重要”。[3]他还认为农民问题应包括12个问题:“1、土地问题;2、地租问题;3、田赋问题;4、高利贷问题;5、苛税问题;6、苛捐问题;7、高贵的工业品和低廉的农产品;8、天灾问题;9、资本匮乏;10、政治问题;11、文化问题;12、失业问题。”[4]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是非常深透的,这对解决农民问题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毛泽东在主持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期间,还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当时出版的有26种,他亲自为该丛刊撰写了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是一篇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理论著作,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

会拥护这个革命”。[5]他在1927年1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别。又指出,贫农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6]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农民运动的经验,为我党今后制定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奠定了基础,从而解决了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村革命斗争中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非常重视培养农运干部。他1926年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期间,亲自讲课。1927年又主持开办了武昌农讲所,继续培养农运干部。毫无疑问,这为后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有着重大意义。

二、将革命中心从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失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城市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组织受到了严重摧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占据了中心城市。因此,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再难在城市立足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大城市搞工人暴动去夺取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事实上,从1927年夏天到1928年,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国各地举行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包括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卢德铭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都证明靠攻打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强大的敌人已占据了这些城市,革命势力难以在城市立足。

而广大的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共产党可以在广大农村发动、组织农民，发展党组织，积聚革命力量，保留回旋余地。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要继续领导革命，就必须把工作的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攻打城市失利后的关键时刻，着手整顿队伍，并把其带到农村和山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和俄国都不一样。因此，中国的革命道路也与它们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壮大，因而能够举行像巴黎公社那么大的武装起义。而列宁所处的时代，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而在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使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成功地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而中国自1840年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政治上缺乏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封建军阀割据严重的国家。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7]同时，中国属经济落后、分散的农业国，工业十分薄弱，而统治阶级凭借强大的力量占据中心城市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的统治。

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不统一和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也决定了中国革命首先应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游击战争。然后在各地积聚力量，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8]这样，共产党通过夺取一块一块的阵地，使革命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三、论述农村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9]在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的许多地方，都曾有过广大的工农革命运动，那里有工会组织、农民协会，曾有过与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光荣历史，也有过割据的经验和教训，这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基础。如广东的海丰，1923年至1925年，在彭湃等领导下，曾经形成了强大的革命运动，对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两次东征讨伐封建军阀陈炯明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尔后，海丰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毛泽东指出：“陈炯明的故乡历来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五万户二十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刮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百姓人民的事几乎绝迹”。还指出：“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10]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海丰人民在党组织和彭湃的领导下，于4月、9月、10月先后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曾在陆丰和海丰建立了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1928年4月。而在1927年12月11日，广州的工农群众、革命士兵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联合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军队进行激烈的战斗，但因敌我力量殊，广州起义失败，大多数队伍转到海陆丰农村，与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在湖南省东部，1927年9月爆发了著名的秋收起义，起义的农民武装曾攻打城市，占据了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后因敌强我弱，队伍也相继退出城市转到湘赣边界农村，队伍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

行改编,随后向井冈山进军,在那里宣传发动农民,发展党组织,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1928年1月,在湖南南部的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县举行农民武装起义,建立的革命政权达3个月之久。在湖北东北部的孝感、麻城、黄安等地,1927年秋有过数万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曾占领黄县城达30多天。

上述这些事例,说明了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省有革命的群众基础,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根据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特点,在秋收起义受挫后,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井冈山转移,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贡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即斗争中心从城市转到农村,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好转。

1928年10月14日,在井冈山茅坪召开的边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根据地问题、土地问题,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还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这次大会决议案的一部分,它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对全国各地的农村革命斗争有重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1930年以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推动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全国15

个革命根据地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红军不仅在数量上和编制上有了发展，而且形成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燃遍大江南北，各地的革命政权相继建立。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重要法令，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枪杆子创造出来的工农当家作主的崭新的红色政权。

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宣告：“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11]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表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Z〕.1925年11月26日

〔2〕中国农民.第2期〔J〕.1926.2。

〔3〕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生金绍的听课笔记〔Z〕.1926。

〔4〕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生冯文江的听课笔记〔Z〕.1926。

〔5〕〔10〕农民运动。第8期〔Z〕.1926.9。

〔6〕〔7〕〔8〕〔9〕〔1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2,51,51,51, 1316-1317。

（作者：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研究员）

试述毛泽东早期统战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陆 米 强

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毛泽东就在革命实践中提出实行全国民众大联合，组成革命的同盟军，结成严密的联合战线，共同奋斗，以民主派战胜军阀派，去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等有关统一战线的重大革命战略思想。

一、五四运动后毛泽东萌生“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毛泽东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开始，在寻找救国道路和探求革命真理的实践中，发现了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于是在他的头脑中萌发了初步的统战思想。

毛泽东早期统战思想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中有最集中的反映。此文连载于《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文章不仅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而且也第一次提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人民大联合的胜利。他认为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诸如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界救国联合会等人民团体，已经是一种相当大的联合组织了，这就证明全国人民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组成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还在文章的结尾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

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提出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1919年8月24日,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6期专门介绍说:《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2]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和强烈反响,特别是对青年学生启发很大,萧劲光和任弼时就是在它的“巨大的革命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3]成都出版的刊物《星期日》曾将《民众的大联合》全文转载,这对四川后来一连串的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直到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还在上海的刊物写文章,介绍毛泽东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五四运动后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也无不表示赞同和敬佩。[4]

而对毛泽东本人来说,他对民众的大联合的思考,为他以后进一步探索革命统一战线这个重大问题,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中共建党前夕毛泽东再次完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毛泽东再次提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在1920年建党前夕。该年2月,为了推动湖南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派彭璜等人组成驱张代表团到达上海,并决定在上海创办《天问》周刊,以扩大驱张宣传。2月1日,《天问》第1号《发刊词》指出:军阀在湖南实行残暴统治,民众到处告状,然而北洋政府“既坐视而不之救”,“万恶之张敬尧而不能去”,“惟有民众之自决”。《发刊词》阐明了毛泽东等人决心依靠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力量,采取民众自决运动的方法,把军阀张敬尧从湖南